

## 联合早报 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的更明智之举

新加坡《联合早报》7日发表题为《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的更明智之举》的文章，作者陈天宗、杜强。陈天宗（Curtis S. Chin）是亚洲理工学院资深院士及住校高管（Executive-in-Residence）；杜强（John A. Donaldson）是新加坡管理大学政治科学副教授。内容如下：

为刺激经济发展，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新措施。据《纽约时报》报道，这次经济刺激配套包括投资几千亿元兴建基础建设。但是这种做法是否就会让经济学家、投资者和人民放宽心呢？其中一个问题就是，人民可以从这些措施得到多少实惠？

虽然这次投资不像中国总理温家宝 2009 年宣布的 4 万亿人民币（5850 亿美元）的经济刺激配套那样大手笔，但舆论还是担心，这次的投资也会像以往一样，浪费在“形象工程”和其它华而不实的项目上。

基础建设是亚洲决策者十分熟悉的难题：到底多少基础建设是“够用”？到底什么类型的基础建设是“实用”？尤其是对于发展中的经济体，各种社会需求都十分迫切、都亟需相应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去解决，哪些项目应该优先考虑呢？中国的经验证实有时候项目越小越有效。

近年来，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抱负已经不能用“小”来形容。三峡大坝、北京奥运、上海世博以及高铁系统，这些都是中国崛起的突出代表。然而，大规模的投入并没有带来很高的回报。

不容置疑，中国和亚洲的其他地区仍然需要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。但问题在于，政策制定者脑袋里着迷的是那些大型、令人叹为观止的建设项目。虽然不实用，华丽的东西在刚开始总会获得注意和艳羡——想想奥运前，鸟巢和水立方是多么光彩迷人。可惜的是，这些众所周知的事实经常在政治洗牌的过程中流失。建设农村供电、供水和基本卫生系统，显而易见会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和健康状况。但是在做投资决策的时候，这些项目经常会“靠边站”，为那些规模宏大的项目让路。表扬和升官经常是被越大越好的理念所操纵。

### 大型工程并不惠民

现实生活中，这样的巨大反差十分惊人。云南省红河州骄傲地宣称，他们建成了一座耗资近 8 亿元（人民币，下同）的政府园区。整个园区气派非凡。很多人认为它可以和天安门广场的人民大会堂相媲美。然而，就在离它仅几公里远的地方，崎岖肮脏的小路旁，农民还过着和父辈一样贫穷落后的生活。由于缺乏充足的灌溉系统，又没有当地发展计划的经济扶持，这些农民依旧为如何维持生存而苦苦挣扎。

同样的在红河州，屏边县政府据报道花费了超过两亿元来建设一个公共广场，和一个尽管极少被使用但相当引人注目的足球体育场。如果把建设这些项目的钱，投在改善教育和人民生计，以及寻求吸引投资方面，应该可以更好的为当地县民服务。

在云南省，昭通州贫苦不堪的境况曾使当时的总理朱镕基伤心落泪。随后为了脱贫致富，高速公路修建起来。但是只有高速公路却没有连接分布零散的农村的基础设施，农民因此受益有限。

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强调，建立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：发展要公平合理，而非不计后果。事实上，早在 1980 年代，作为贫困省贵州一把手的胡锦涛，就强调要先修连接农民到市场的乡村路，而不要先建漂亮昂贵的高速公路。因为前者让农民们直接受惠。他也鼓励农民去外地打工，要地方政府为农民工提供培训、信息和资金等各类支持。而且在他的领导下，农家乐一系列直接让农民参与的旅游形式也建立了起来。受益于这些政策，贵州的贫困率迅速下降，虽然它的 GDP 发展速度缓慢。

贵州并非这种小型投入，创造机会的唯一受惠者。1970 年代末，中国土地改革，就是把大片农田分割成小块土地，让农户可以根据各家情况承包使用。这种包产到户使得成千上亿的农民几年内迅速脱贫。同样，中国创富的代表温州，最初也是基于小型企业而逐步发展起来的。现在中国无论是沿海还是城镇，有几千万的农民工在这种小型工厂里忙碌着。这种小型化、低成本、低技术含量的工厂，为教育水平相对较低的工人创造了就业机会。

由此推想，中国新一轮的经济刺激配套是可以让更多人受益的。地方领导者要关注那些对经济和人民生活有切实改变的建设项目，而不要只盯着那些所谓能提高知名度的花架子工程。据《联合早报》5 月 31 日报道，中国刚刚宣布的配套里，包括 660 亿元补助公租房，265 亿元补贴节能家电。这种措施就更直接关系民生。小型投入，创造机会的策略过去可行，现在依旧可行。如此，中国的领导人也能抓住机会，创造一个真正和谐公平的社会。